



目 录

第一章 绪 论	1
一、文明交流互鉴新格局下外语教育的历史使命与时代答卷	1
二、外语教育在国际传播能力建设中的新责任和新担当	5
三、外语教育学的定义、宗旨、使命和行动旨趣	10
四、本书结构	11
第二章 研究背景与现状	13
一、关于我国外语教育研究与实践的若干问题	13
二、外语教育术语及其概念之辨之一：教学与教育、工具性与人文性	32
三、外语教育术语及其概念之辨之二：理论、流派与方法	42
四、对外语教育中国化的几点思考	57
第三章 构建中国特色外语教育理论的思考	61
一、外语教育能力建设是提升国际传播力的基本前提	61
二、推进外语教育研究理论化系统化	63
三、提升学术理论自信，推进我国高校英语专业教育教学理论的本土化	65
四、创建外语教育学学科时机已成熟	71
第四章 构建中国特色外语教育理论需关切的若干方面	75
一、我国高校外语教育问题研究：外语教育学视角	75
二、关于构建外语教育学若干问题的思考	88
三、外语教育的活水源流在于外语师生的专业素养和思想力	98
四、民族地区基础外语教育的思想自觉和自觉行为	111

第五章 外语教育学的学科建构研究	128
一、外语教育属于什么学科?——外语教育学构建的 必要性及相关问题探析	128
二、论外语教育学的学科建构	143
三、外语教育学的学科属性与目标	162
四、外语教育学的新理念和新格局	166
五、外语教育学的建构历程、意义与学科特点	179
第六章 外语教育学与相近学科的关系	195
一、外语教育学与传统外语教育学科之间的关系	195
二、外语教育学与语言学的关系	209
第七章 展望	226
一、外语学科发展的困境与出路:外语教育学视角	226
二、外语人才培养的困境与出路:外语教育学视角	229
三、外语教师发展的困境与出路:外语教育学视角	232
参考文献	236

第一章 絮 论

外语教育是我国教育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对推进文明互鉴、加强国际传播、培养世界眼光、增进全球心灵沟通等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经新中国成立以来70多年的发展，我国外语教育至少在“两化”方面成绩显著：一是为我国的国际化进程做出不可磨灭的贡献，试想，如果没有外语教育，我国的国际化步伐就不大可能迈得如此快速而稳实；二是为我国全民的外语普及化已做出无可否认的贡献，试想，若没有外语教育，外语不可能如此普遍地走进“寻常百姓家”，散发出人间烟火气。但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尤其是在人工智能迭代发展的今天，我们是否仍需要外语教育？新时代的外语教育有何责任与担当？该如何交出一份时代的答卷？人工智能时代外语教育究竟在哪些方面具有不可取代性？该如何办好符合我国国情、校情、育情、教情和学情的外语教育？诸如此类问题，是我国外语教育当下面临的重要课题。特别是在新近几年，全球文科教育正日渐萎缩、我国外语教育地位正持续下滑、外语专业正面临巨大生存危机。如此背景下，我们是否依然需要外语教育以及如何开展外语教育等议题，更值得我们思量。在此我们仅从文明交流互鉴和国际传播能力这两个视角谈谈外语教育的不可或缺性。

一、文明交流互鉴新格局下外语教育的历史使命与时代答卷

语言不单单是表面的词语和句子，而是一个民族的文化、思维和灵魂的折射；语言的每一个单词，都记录着一个民族的一段文明演变，都隐藏着一个民族的历史逻辑；把握一门语言的词汇，基本上就能知晓这一民族的历史

发展轨迹。而且，懂语言，我们懂的不仅仅是其语义，而是能触摸到语言背后的情感，能感知一个民族的脉搏律动和心灵的呼吸。各个国家和各个民族的文明交流互鉴需要以语言为通用接口去链接国与国之间以及民族与民族之间的情感、脉搏和心灵。2014年3月27日，习近平主席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部发表演讲时提出：“文明因交流而多彩，文明因互鉴而丰富”（习近平2014）。习近平主席在2023年3月15日发表题为《携手同行现代化之路》的主旨讲话中指出：“我们要共同倡导尊重世界文明多样性，坚持文明平等、互鉴、对话、包容，以文明交流超越文明隔阂、文明互鉴超越文明冲突、文明包容超越文明优越”（习近平2023）。人类文明在漫长的演进过程中，各民族的文明既在自成一格的相对隔绝中持续前行，又不断走向交流与融合，存续多姿多彩的人类文明形态，又生成出不断交融的人类文明整体，造就人类文明在当今世界既具多样性又具一体性，前者缘于文明的多源和多元，后者催生于人类因共处同一星球而需要文明交流互鉴，和而不同，不同而和。需关切的是，文明源头不同必然衍生语言的不同，“外语”就是不同语言的代名词，用来表达不同文明的历史轨迹、民族心理、价值取向、民情风俗、社会现实和思维方式，但当人类文明的交流互鉴呼唤外语教育的时代担当，承担外语教育的历史使命，语达则心通，心通则情融，情融则志同，志同则力聚，力聚则文明交流互鉴之路便能畅达。在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进程中，文明交流互鉴尤为重要，外语教育因此更需大显身手，在文明交流互鉴的大舞台上展现更多风采。然而，我国外语教育能否为文明交流互鉴培育更高质量的外语人才？能否勇担历史使命开新局？这已成为当前亟须外语教育界探究的重要课题。

1. 文明交流互鉴需要语言为媒传递信息

文明交流互鉴须有语言媒质为前提，以此才能传递信息，沟通情感，助推世界和平。若没有语言的桥接，文明交流互鉴势必陷入一厢情愿之境；若没有语言的舟车作用，文明交流互鉴势必寸步难行；若没有语言的支撑，文明交流互鉴势必成为空中楼阁。因此，文明交流互鉴给外语教育既带来更为

广阔的用武之地，也带来严峻的挑战。如上所言，经新中国成立以来70多年的发展，外语教育已为我国的国际化和外语的普及化做出突出贡献，但是，外语教育的质量离当今文明交流互鉴的要求和期待尚有较大距离，仍难以完全胜任时代赋予的使命，需引起学界高度关切。外语教育目前存在的问题主要有五：一是有“教”欠“育”。时下的外语教育大多停滞于听、说、读、写、译、视等基本技能的教学，尚未上升至以推进文明交流互鉴为己任的外语育人高度，即教有余，而育不足。二是甘当“装卸工”。长期以来，中国的外语教育大多是卸下国外的理论和方法，装入中国语境，演他人脚本，说他人台词，他者性明显，自主性缺席。三是对共性与个性认识不足。外语教育研究尚未真正把握中国人学外语与西方人学外语的共性与个性，在理论研究和实践探索中偏重于对共性的思考，但对个性思考欠缺，未能充分观照以表意文字的语言为母语的外语学习者与以表音文字的语言为母语的外语学习者在外语学习中所具有的诸多个性化表现。四是外语教育学科地位久未确定。目前我国各学段有近3亿学生学外语，大中小学外语教师已达近170万。作为一个如此庞大的群体所从事的外语学习和教育工作，长期以来未能得到学界专门的研究和应有的关怀，其学科地位不显，作为外国语言文学下属的二级学科地位至2024年1月才得到确立。五是师资培训缺乏系统性。目前虽有各种师资培训，但政策的实施往往因地因时而异，培训内容也缺乏连贯性和系统性，因培训师而设课的现象较为普遍。诸如此类问题不一而足，在一定程度上阻滞了我国外语教育的有效发展，从而难以满足为文明交流互鉴服务的要求和期待。

2. 外语在文明交流互鉴中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

历史上有许多名流都曾觉悟到语言在文明交流互鉴中的重要作用。查理曼大帝（Charlemagne）曾强调，拥有另一种语言就是拥有第二个灵魂。美国语言学家本杰明·李·沃尔夫（Benjamin Lee Whorf）指出，语言塑造了我们思考的方式，并决定了我们可以思考什么。南非前总统纳尔逊·罗利赫拉赫拉·曼德拉（Nelson Rolihlahla Mandela）曾说，如果你用一个人听

得懂的语言与他交流，他会入脑，而如果你用他自己的语言与他交流，他就会入心。美国语言心理学家弗兰克·史密斯（Frank Smith）说，一种语言可以为人生开启一条走廊，两种语言则会使这条人生走廊的沿途处处开启大门。英国作家杰弗里·威兰斯（Geoffrey Willans）指出，除非你掌握了两门以上的语言，否则你永远无法真正理解一门语言。法国哲学家亨利·柏格森（Henri Bergson）声称，有语言，共同行动才有可能。德国诗人约翰·沃尔夫冈·冯·歌德（Johann Wolfgang von Goethe）认为，不了解外语的人也无法真正了解自己的语言。美国女权主义作家丽塔·梅·布朗（Rita Mae Brown）说得更为晓畅，提出语言是文化的路线图，能告诉你它的人民来自哪里，他们又要去哪里。这些名流的话无不反映出他们对语言的真知灼见。

2014年3月，习近平主席在柏林会见德国汉学家、孔子学院教师代表和学习汉语的学生代表时指出：“沟通交流的重要工具就是语言。一个国家文化的魅力、一个民族的凝聚力主要通过语言表达和传递。掌握一种语言就是掌握了通往一国文化的钥匙。”2022年12月，习近平主席复信沙特中文学习者代表时强调：“语言是了解一个国家最好的钥匙。”2021年，习近平主席在给北京外国语大学老教授们的回信中明确强调，“深化中外交流……讲好中国故事，需要大批外语人才”。习近平主席的这些重要话语是我们开展文明交流互鉴的根本遵循，应引起我们高度重视。文明交流互鉴需要语言铺路，以此促进民心沟通。在此的语言显然就是指外语，由此自然需要大批精通外语的人才。大批外语人才存在的前提是需要外语人才的高效培养，即首先需要有高质量的外语教育。针对上述五大问题的现实存在，为交出一份让社会满意的時代答卷，我们迫切需要从五个方面破解。其一，促进外语教育从“教”到“育”的融通和升华。有教无育，止于教；有育无教，教尚可求；教止于技，育行于魂。当前，我们应着力培养既有扎实母语与外语功底，又具有家国情怀、善于文化包容、视野开阔的外语人才。其二，需以现实国情为依据，深入调研我国外语教育的国情、校情、育情、教情和学情，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注重我国外语教育知识体系的自主创生，筑塑我国外语教育发展新格局。其三，探寻中国外语教育与外国外语教育的共性与个性，透视真问题，寻求新方法，提出新见解，掌握真正属于中国自己的外语教育“核

心技术”。其四，加强学科建设。外语教育是一个有机系统，而不是单凭“外语课程研究”“外语教学研究”“外语测评研究”“外语教材研究”或“外语教师发展”等某单一维度就能覆盖外语教育全部。因此，应强化学科建设，实现各维度的协调推进、同频共振，彰显中国外语教育的自主性、主体性和原创性。其五，加强外语教师的系统性培训。外语教师强，则外语教育强，纵使外语教育理论和方法有千种万种，没有优秀师资，一切理论和方法都会失效或归零。外语教师的专业素养、教育能力和思想力始终是决定成败的关键。我们需要将外语教师培养成为教育的卓越创新者、计划的高明实施者、教学的高超设计者、技术的有效开发者、资源的精湛整合者、数据的精妙分析者，使他们成为真正的经师、能师和人师。

语言的声音，我们听得见；语言的词语，我们看得见。但是，可听和可见的世界，均属物理世界，而潜隐于语言背后的民族的性格、精神和思想，我们在物理上既听不到，也看不见。需要明了的是，真正决定文明进程和前行的，往往就是隐匿于语言背后的民族的性格、精神和思想。推进外语教育，就是为了在教外语的声音、读外语词语的同时，去体悟目标语民族不同的性格、精神和思想，去体验和借鉴这种性格、精神和思想所创造的不一样的文明。当今世界，文明的魅力就在于多样，多样的文明需要交流，交流的文明是以互鉴为旨归，呼唤外语教育的历史担当，需要我们交出一份令社会满意的时代答卷。

二、外语教育在国际传播能力建设中的新责任和新担当¹

外语不仅是沟通的工具，更是国际传播的一张隐形的门票。我们一旦能借用外语听懂世界，世界也会开始听我们说话。在加强国际传播能力建设的进程中，外语教育具有责无旁贷的重要作用，同时也具有不可忽视的重要作

¹ 本节的主要内容已发表于《当代外语研究》2023年第4期：5–7, 36，王文斌，“外语教育在国际传播能力建设和文明互鉴中的新责任和新担当”。在此略有改动。

用，应知责于心、担责于身、履责于行，更应践行新责任，挺膺新担当。

2016年2月19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新闻舆论工作座谈会上强调：“要加强国际传播能力建设，增强国际话语权，集中讲好中国故事，同时优化战略布局，着力打造具有较强国际影响的外宣旗舰媒体”（习近平 2018：333）。2021年5月31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中共十九届中央政治局第三十次集体学习时的讲话中指出，要全面提升国际传播效能，建强适应新时代国际传播需要的专门人才队伍。……推进中国故事和中国声音的全球化表达、区域化表达、分众化表达，增强国际传播的亲和力和实效性。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习近平总书记重申：“增强中华文明传播力影响力。坚守中华文化立场，提炼展示中华文明的精神标识和文化精髓，加快构建中国话语和中国叙事体系，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展现可信、可爱、可敬的中国形象。加强国际传播能力建设，全面提升国际传播效能，形成同我国综合国力和国际地位相匹配的国际话语权。”（习近平 2022：45—46）从这些讲话和报告的精神中不难看出，习近平总书记近年来高度重视我国国际传播能力建设，已提出一系列新思想、新观点和新论断，为我们今后的外语教育研究和实践指明了方向，也为外语教育研究和实践明确了遵循的路径，对此我们需要深入学习并全面贯彻，踔厉奋发，努力提升国际传播能力。需要明了的是，国际传播能力建设不仅让中华文化走向世界，更是增强世界文明互鉴的关键路径，达成世界文明互鉴才是加强国际传播能力建设的主要目的，其终极目标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促进不同文明之间兼收并容、相互交流、相互借鉴、共同精进。可以说，提升国际传播能力是切入点，助推世界文明互鉴是发力点，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落脚点。

近些年来，在探讨该如何加强国际传播能力建设中，许多学者潜心研究，建言献策，已提出许多理论和实践方法，在传播的内容、技术、途径、理念等方面已有新的突破，也有新的进展，已取得一批新的研究成果。但我们应清醒地认识到，当前国际舆论中“西强我弱”的格局尚未发生根本性的转变；国际反华势力猖獗，散布许多虚假信息，颠倒黑白，编造许多“世纪谎言”污蔑抹黑中国，目前我们还没有足够的能力借用外语媒质进行完全有效的应对；我国在国际传播中“有理说不出，说了传不开，传开叫不响”的

被动局面依然不同程度地存在；“中国故事、国际表达”的目标因对不准频道、发不准声调而尚未完全实现；话语体系、叙事方式、观点阐述、情感传达等，与我国的大国地位、国际水准、现实需求相比仍严重滞后；“乐于接受的方式、易于理解的语言”这一重要的对外传播手段尚未真正掌握；中华文明的独特性和对人类的伟大贡献尚未完全被世界所理解和欣赏；世界各文明之间交流互鉴的平等话语权远未建立；植根于中华民族心灵深处的“美美与共”的理念尚未被世界所普遍接受；习近平总书记所强调的“着力打造具有较强国际影响的外宣旗舰媒体”尚未得到有效的构建，等等。所有这些问题的存在，原因固然有多种，但其中一个不容忽视的原因是，目前学界对于外语作为主要媒质在加强国际传播能力建设中的不可替代的作用，尚未给予高度的关切，而外语界自身在理论研究和实践探索中也依然拘泥于传统思维模式，束缚于传统的教育教学方式。

国际传播有别于国内传播，在许多情况下我们需要使用受传国语言即外语来传播中国声音、中国情感、中国主张、中国故事、中国成就、中国文明和中国文化等。若不借助外语，我们苦心孤诣、精心策划的传播计划和内容都会因难以走出国门而付之东流，广泛的国际传播终将成为空谈。可见，外语在国际传播中具有基础性和全局性地位。尽管我们一直在大力推进国际中文教育，并已看到显著的成效，但中文目前还难以像英语一样能成为国际语言，在国际传播的进程中若完全依靠中文，至少在短时期内还存在诸多困难，目前既不现实，也不具操作性。中国的历史、国情、民情、习俗、价值观、人权观、生存权、社会制度、发展水平等，都需要与各国人民开展广泛而深入的交流和沟通，许多美好的故事都需要借助外语走出国门，中国人民美好的情感才能有效地走入他国人民的心田。总之，外语是国际传播的纽带和舟车。国际传播能力建设呼唤外语教育的新责任和新担当。

为回应国际传播的呼唤，外语教育应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推动国际传播能力建设。外语教育虽自新中国成立以来，尤其自改革开放以来，在我国的国际化进程和国民的外语普及化等方面已取得重大成就，但目前外语教育尚未完全以提升国际传播能力为旨归，常受制于国外理论，甚至惯于照搬或模仿国外理论，把国外的理论看成是我们

的未来和真理，对国家培养高端外语人才的需求难以精准应对，外语教育理论与实践严重割裂，这些问题长期为社会所诟病。之所以存在这些问题，其原因固然复杂，但主因在于四个“尚未”：一是尚未理性和能动地处理好理论“外引”与理论“内生”的关系，过度倚重甚至迷信国外外语教育理论与实践，将国外的外语教育理论当作偶像崇拜，接受其思想的“照耀”，并附魅于其理论框架，无视中国的外语教育历史、传统和现实中存在的各种问题，在中国干“国外外语教育的事”，使得“进口”的外语教育理论在中国出现“无祖”“无根”和“无土”现象；二是如上所提，尚未真正把握中国人学外语不同于西方人学外语的特殊性和普遍性，至今未能创生出切合中国国情、校情、育情、教情和学情的“在地性”外语教育理论与实践体系，缺乏真正属于我们中国人的外语教育“核心技术”和“硬核技术”；三是尚未提升理论自信和理论自觉，惯于照搬、紧跟或模仿国外理论和实践，缺乏自我理论构建的自信和自我实践的勇气，在许多方面沦为国外理论和实践的“打工仔”。四是尚未在外语教育研究中，用自己的双脚去丈量祖国的大地，对国家各类别的高校、各学段的学校进行深入的调研，深度把握国情、校情、育情、教情和学情，以无差别化的教育教学标准实施于有差别化的各类高校和各层次的学校，对学生进行无差别化的教育教学，而且惯于自闭于书斋，仅阅读相关文献，耽于自我构思，关门造车，使得写出的论文或专著充满学究味，常将一些简单的问题复杂化，难以接地气，缺少应有的人情烟火气，甚至让相当一部分教师难以读懂我们的论文和专著。

所有这些问题，值得我国外语界深入探究。我们认为，外语教育需以国际传播能力建设为己任，推进理论创新和实践创新，强化理论建设和实践探索的自觉性、自在性和自为性。

理论建设主要涉及五个方面：（1）创新国际传播策略研究，识辨对外传播与对内传播的差异，关注受传国语言的研究和有效传播途径，丰富传播学的内涵和外延，充分认识到在国际传播中外语使用的有效与否是决定对外传播成败的关键之一；（2）强化语言比较和语言对比的理论研究，深刻认识语言是国际传播不可或缺的载体，唯有借助语言才能进行民心沟通和中国文化的远播；（3）构建能满足国际传播能力建设需求并符合中国实际的自主外语教

育理论，加强实地的调查研究，把研究做在中国大地上，力争为世界贡献中国外语教育智慧，打造具有中国特色的外语教育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彰显我国外语教育研究的特色性、主体性与原创性；（4）明确我国外语教育的研究内涵，找准外语教育的研究范畴，锁定外语教育研究的主要议题，保持外语教育研究各维度的相对独立和有机统一，构建外语教育学理论框架，总体布局，协调推进，与国家发展战略同向同行；（5）加强外语教育学与国际传播学的对接研究，培养既懂国际传播又能促进世界文明互鉴的外语复合型人才。

在实践探索方面，主要涉及七个方面：（1）以外语为媒质，提升我国国际传播力，讲好中国故事，展现真实、立体、全面的中国，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2）坚定文化自信和外语学科自信，坚持用外语讲好并传播好中国故事，让中华文明融入世界文明，发出中华文明强音，为培养能提升国际传播力和增强世界文明互鉴的外语人才贡献力量，同时也能用汉语讲好外国的故事，让一些先进的异域文化走入中国大地，达致美美与共；（3）转变外语教师单纯为教外语而教外语的思路和观念，树立国之大者思维，增强国家意识，做到洋文虽出自自我口，但我心依然是中国心；（4）创新外语教育实践体系，深度考察影响国际传播的主要因素，包括外语媒质、语言障碍、信息失真、人为因素、国别特征等；（5）强化教师发展，建设真正懂国际传播的新型外语教师队伍，分语种、分层次进行规划设计，提升外语师资队伍的外语教育水平，增强我国的外语教育能力；（6）建设与国际传播力相匹配的系列外语教材，融入跨文化对比、民族思维差异对比、语言对比、区域国别研究等内容；（7）加强课程模块化建设，优化课程体系，突显国际传播与外语教育的课程模块特色，促进外语学科在新时期学科交叉性，谋划外语教育发展新格局。总之，我国外语教育需要以新迎新，因时因势，以变应变，变中求变，践行新责任，展现新担当，用心、用情、用力地服务国际传播能力建设。

三、外语教育学的定义、宗旨、使命和行动旨趣

1. 定义

外语教育学是一门以提高国家整体外语教育能力为根本目的、以真问题为导向、系统探究外语教育全过程以及影响这一过程的各紧密相关要素、揭示外语教育的规律和本质、提升国家整体外语能力、服务国家发展战略的学问。“外语教育学”的英文名称是：“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Studies”。

2. 宗旨

外语教育学的宗旨是：用心用力于顶层设计，统筹兼顾，总体布局，整体把握，以中国主体、世界眼光，打破外语教育各维度的碎片化和割裂化研究局面，使外语教育各维度的研究形成有机的组合拳，彼此同频共振，绘制外语教育理论研究与实践的同心圆，提升国家整体外语教育能力，高效培养外语人才，服务国家外语教育发展战略。

3. 使命

外语教育学的使命至少包含六个方面：（1）提升我国的整体外语教育能力，破解我国外语教育目前存在的各种难题，透视各种真问题；（2）解决我国外语教育研究和实践的学科归属问题，同时为我国众多的大中小学外语教师谋求教育工作之家、学科之家和学术之家；（3）真正聚焦外语教育本身的理论研究和实践，摆脱应用语言学研究内涵过于宽泛的松散局面；（4）打造外语教育各维度研究的同心圆，锤破外语教育碎片化和割裂化研究的困局；（5）增强理论自信和学科自觉，强化实践的自主性和自为性，构建国外目前尚无的外语教育学学科，放眼全球，立足中国现实，强化国家意识，办中国的外语教育，而不是办外语教育在中国；（6）关注外语教育一线需求，强化学术引领，专注外语教育理论与实践前沿，开展跨学科研究，推动外语教育

学自主知识体系的创生，包括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的建设。

4. 行动旨趣

为全国大中小学外语教育工作者搭建外语教育理论研究和实践探索之家，在人机共存时代，重塑外语教育思维结构和理念转型，推进理论与实践的高度统一，唤醒内心性灵，不断稳定内核，化外取为内求，向内扎根，向阳而生，为我国外语教育事业的进一步发展奉献应有的方案、力量和智慧。

四、本书结构

本书共分七章。本章为第一章，即“绪论”，主要讲述外语教育的重要作用、历史责任和时代担当。

第二章主要介述我国外语教育所取得的成就以及当下面临的主要议题，并从研究的角度出发，指出我国外语教育研究的不足，如关键概念不清、术语含混等，进而提出创建外语教育学独立学科地位的必要性、迫切性和重要性。

第三章侧重讨论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自主外语教育理论的重要性。该章首先提出外语教育学、外语教育能力等重要概念，然后强调学术理论自信的重要性，最后阐明创建外语教育学独立学科地位已具备的条件。

第四章阐述构建外语教育学所需关注的若干方面。该章首先通过实证调研，阐明我国外语教育存在的问题，以此切入，析述建设外语教育学的必要性，然后从理论层面，论述为何需要构建外语教育学的独立学科地位，以及如何提高外语教育水平等问题。本章最后论述了外语教育学对民族地区外语教育的独特作用。

第五章着重探讨外语教育学的学科建设。该章首先探讨了外语教育学的学科性质和地位，然后阐释外语教育学的重要作用，以及学科属性、学科目标等一系列问题。本章最后回顾外语教育学学科建构的历程，陈述尚待解决

的问题。

本书第六章着重探讨外语教育学与应用语言学、二语习得、外语课程与教学论之间的联系与区别，以及外语教育学与语言学学科的关系，进一步深化学界对外语教育学独特性的了解。

第七章为最后一章，该章旨在从宏观的维度，阐释外语教育学对外语学科发展、外语人才培养和外语教师发展当下面临困境的启示意义，凝练外语教育学对外语学科和专业发展的当代价值。